

民以食为天,中国是一个讲究吃的国家。中国的餐饮文化源远流长。然而,由于最近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,人们开始反思合餐制带来的风险。不少人更是提出要向西方学习分餐制。其实,分餐、公筷并不是西方独有的饮食方式。中国人的老祖宗早在几千年前,就采用分餐制了。下面我们就从考古研究来看一下,中国的分餐文化。

从考古研究看中国的分餐文化

■ 闻 文

一人一案诞生分餐制

分餐制在中国具有数千年的历史。考古发现表明,分餐制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中就已诞生。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中发现了饮食用的木案,其平面多为长方形或圆角长方形,长约90-120厘米,宽约25-40厘米。案下三面有木条做成的支架,通高约10-18厘米。木案通涂红彩,有的还用白色绘出边框图案,案上还放有多种酒具,有木杯、木觚、陶甗等,是分餐制方式的实物代表。在新石器时代,生产力水平较低,氏族的族人们共同捕猎采集食物,然后平均分配食物,以分餐而食为主。

到了周朝,分餐制的要求更为严格。《礼记》记载很清楚:“天子之豆二十有六,诸公十有六,诸侯十有二,上大夫八,下大夫六。”这里的“豆”不是指豌豆扁豆,指的是一种盛装食物的容器。这句话的意思即天子的食物有26道菜,公爵官员为16道,诸侯12道,上大夫8道,下大夫仅有6道菜。

从菜肴的数量可知:不同地位身份的人,可享用的美食数量也不同。这意味着周朝的分餐制,代表了地位的尊卑。此外,《周礼》《礼记》中还对面具样式、食物内容、餐具摆放、座位排序等方面,都做出了严苛的等级规定。

先秦时期,受到儒家文化影响,饮食文化中“长幼尊卑”的概念更加深入人心。长幼尊卑、主客有别的思想,甚至影响了后来整个封建时代。南唐著名的《韩熙载夜宴图》就体现了这一点。从画中细节可以看出,韩熙载和其他4名朝廷官员把酒言欢。两个食桌,一大一小,韩熙载与其中3人坐一桌,另一位官员坐小桌,且这张桌子较主桌更矮。这些细节推断出——4人的身份、地位是尊卑有区别的。

此外,大量的汉墓壁画、画像石和画像砖等考古发现中,也可看到席地而坐、一人一案的场景,而漆案、陶案在汉墓随葬品组合中亦十分常见。

在这个时期,分餐制占据了主流。一方面是由于受到传统礼教思想的影响,分餐作为一种突出长幼尊卑、主客有别的用餐方式容易被接受;另一方面,当时低矮的家具样式配以人们席地而坐的姿势也更加方便,于是便诞生了一人一案分餐制。

椅子的出现改分餐为合餐

西晋王朝灭亡以后,生活在北方的匈奴、羯、鲜卑、氐、羌等族陆续进入中原,先后建立了他们的政权,这就是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。频繁的战乱,还有居于国家统治地位民族的变更,使得中原地区自殷周以来建立的传统习俗、生活秩序及与之紧密关联的礼仪制度,受到了一次次强烈的冲击。正是在这种新的历史背景下,导致了家具发展的新趋势,传统

席地而坐的姿势也随之有了改变,常见的跪姿坐受到更轻松的垂足坐姿的冲击,这就促进了高足坐具的使用和流行。公元5—6世纪新出现的高足坐具有束腰圆凳、方凳、胡床、椅子,逐渐取代了铺在地上的席子,“席不正不坐”的传统要求也就慢慢失去了存在的意义。

西安韦氏家族墓中有一副《野宴图》,画中方形食案中部有一道肉食,旁边配有公用的筷子和刀,参加宴饮的男子似乎还保留着盘腿的习俗,但从案上的食物摆放情况来看又是合餐的体现。

此外,敦煌473窟唐代宴饮壁画也描绘了相似场景,画一中凉亭内有9名男女,分坐在两条高足条凳上,中有一长方食桌,摆满了珍馐佳肴,每人面前各有一副餐具。在同时代的其他壁画上,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高足坐具已相当流行,垂足而坐已成为标准姿势。1955年在西安发掘的唐代大宦官高力士之兄高元珪墓,发现墓室壁画中有一个端坐椅子上的墓主人像,双足并排放在地上,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已有标准垂足坐姿的证据。可以肯定地说,在唐代时,至少在唐代中晚期,古代中国人已经基本上抛弃了席地而坐的方式,最终完成了坐姿的革命性改变。

合餐制的流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——唐宋之后科举制度的兴盛。传统贵族不断衰微,上流社会曾经象征着身份、地位的饮食文化也随之没落,简洁的合餐制相较于繁冗的分餐制更容易被社会接受。

重拾分餐更有意义

纵观中国饮食文化几千年发展史,分餐制和合餐制一直在不同阶层的餐饮活动中并存。两者各具优点,并非水火不容。

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,使得人们更加注重健康的生活习惯,更有多地陆续发布推广分餐制、公筷制或双筷制的倡议。据悉,北京市发布“公筷行动公约”,引导市民就餐时使用公筷,并拟将倡导分餐进食、公勺公筷的文明生活方式纳入《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》;山东省率先制定餐饮分餐制地方标准,为餐饮企业提供技术指南;湖南、上海、重庆、广州等城市也纷纷发布倡议……

分餐制是历史的产物,合餐制也是历史的产物。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分餐不仅能避免疾病通过餐具传播,还可以根据每人每餐所需营养合理搭配,保证营养均衡和健康饮食。按需提供餐食,也减少了食物浪费。推广分餐制不仅是为了保卫“舌尖安全”,更是引领一种文明就餐新风尚。虽然,可能一些人还难以理解,但是再难的事,只要具有先进性与科学性,只要对人们的身体健康有好处,就应该积极尝试与推行。在中国曾经通用了3500多年的分餐制,也许还会再流行起来。

四川阆中出土7座南北朝古墓

新华社成都电(记者 童芳)记者近日从四川省阆中市文物管理局了解到,阆中市天宫镇宝珠寺村近日发现7座南北朝古墓。

据介绍,发现的3座砖室墓呈东南西北向,均为当时在蚕丝山南坡砂岩上开竖洞修建,墓室较小,由带榫口的梯形砖砌筑而成,梯形砖的一面有含珠鸟纹、飞鸟纹、几何纹三种图案。在蚕丝山南侧发现的4座墓葬,一座墓室已毁,仅余墓室后壁;两座墓室门已毁,室内填满淤土,未发现有陪葬器物;剩余一座保存较为完整,经清理出土盘口陶壶一件、铁削一件。室内靠后壁为棺台,棺台前各有壁龛一个,村民在墓门外发现有铁釜及青瓷盘口壶,该批古墓的发现对研究南北朝历史和丧葬文化具有较大考古价值。

河南明确9项黄河文化相关重大考古项目

新华社郑州电(记者 桂娟 李文哲)河南省文物局近日发布《关于切实做好黄河文化相关重大考古项目发掘研究传播工作的通知》,明确9项河南省黄河文化相关重大考古项目。

这9项重大考古项目是:与夏文化研究相关的偃师二里头、登封王城岗、禹州瓦店等3处遗址,与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相关的灵宝北阳平、澠池仰韶村、巩义双槐树、郑州大河村、南阳黄山等5处遗址,以及与开封宋都古城保护有关的州桥遗址。

洛阳西汉大墓出土罕见葬器“玉温明”

新华社郑州电(记者 桂娟 双瑞)河南省洛阳市一座西汉大墓出土的若干圆形玉璧、带孔玉片和金丝等,近日被考古人员证实属于一种独特的古代葬器——温明。这种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器物,在中原地区系首次发现。关于温明的最早记载,见于《汉书·霍光传》。西汉权臣霍光死后,皇帝和太后“赐金钱、辇絮、绣被百领……东园温明,皆如乘舆制度”,规格极高。根据描述,温明形状像一个方形的桶,里面带有铜镜,其中一面开口,罩在死者头上。

目前,这座西汉大墓主墓室的实验室考古仍在有序进行,有望为研究中国西汉中晚期高级贵族的生活习惯、埋葬习俗等提供更多实物材料,墓主人的身份也有待进一步求证。

700年琉璃古窑现身成都市区

新华社成都电(记者 童芳)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,该单位在成都市区发现五代至宋元时期瓷窑遗址,出土大量精美瓷器。此次发现的琉璃厂窑,又称“琉璃场窑”“华阳窑”,始烧于五代,延续至明代,历时700余年,是中国著名的古瓷窑场之一。此次发现了窑炉、作坊、水井、排水沟等完整的窑业生产体系,进一步掌握了成都琉璃厂窑的历史沿革、产品面貌、制作工艺、生产性质等文化内涵,为考古、美术、陶瓷工艺等方面的研究、展示和利用,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。